

论刘勰的辞赋学成就

王廷洽

(上海师范大学博物馆, 上海 200234)

摘要: 刘勰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文学家, 尤其擅长于文学评论。所著《文心雕龙》, 系统地阐述了古典的形式主义学理论。这一学说充分地体现在他对于辞赋所作的纯文学形式的研究方面。他探讨了辞赋的渊源和流变, 总结了先秦到刘宋时期辞赋创作的历史, 分析了辞赋的丽辞、章句、夸饰、音韵等文学的形式问题。这一切奠定了辞赋学的基础。

关键词: 古代文学; 刘勰; 辞赋

《文心雕龙》是刘勰古典纯文学形式学说的结晶。他在辞赋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纯文学形式学说体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而且奠定了辞赋学的基础。他的辞赋学成就包括对辞赋不同形式及其渊源的探讨; 总结过从先秦时代到刘宋王朝辞赋发展的历史; 还提供了一系列有关辞赋创作、辞赋批评的纯文学形式的理论。刘勰在辞赋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尚未见全面的介绍, 故笔者将研究辞赋学所获得的点滴心得敷衍成文, 以引美玉。

一、辞赋渊源的探索

在说明辞赋的渊源问题前, 先应该说明辞赋一体的问题, 因为楚辞与汉赋虽属两个不同的时代, 但它们的文学形式实属一体, 不仅两汉学者是这样认识的, 而且《文心雕龙》也往往辞赋并称的。例如屈原、宋玉等人的“楚辞”作品, 在《汉书·艺文志》中则称为屈原赋、唐勒赋、宋玉赋; 又如《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谓“景帝不好辞赋”辞赋连用之例在《史记》、《汉书》中随处可见。刘勰

不仅提出辞赋源自《诗经》和战国诸子, 而且认为祝盟之辞、哀吊之文、谐谑之语等都对辞赋的创作有影响作用。

刘勰在《辨骚》中提出楚辞有两个来源的主张。《辨骚》曰: “自《风》、《雅》寝声, 莫或抽绪, 奇文郁起, 其《离骚》哉! 固已轩翥诗人之后, 奋飞辞家之前”; “故论其典诰则如彼, 语其夸诞则如此, 固知《楚辞》者, 体宪于三代, 而风杂于战国, 乃《雅》《颂》之博徒, 而辞赋之英杰也”。指《楚辞》中具有不少思想性和创作方法同于儒家经典的地方, 又有不少“诡异之辞”、“谲怪之谈”、“狷狭之志”、“荒淫之意”, 属不同于儒家之处。《楚辞》在思想性、创作方法、诗歌形式等方面, 是部分地渊源于《诗经》的; 而其诡谲、夸诞之文风, 则是受了战国诸子的影响。

首先, 刘勰说: “赋、颂、歌、赞, 则《诗》立其本”, 意即辞赋在根本上是继承了《诗经》的传统。公允地说, 号为中兴之主的汉宣帝, 在评价王褒、张子侨等人的赋作时, 就曾指出:

上令褒与张子侨等並待诏, 数从褒

收稿日期: 2002-11-25

作者简介: 王廷洽(1949-), 男, 上海嘉定人,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

等放猎,所幸宫馆,辄为歌颂,第其高下,以差赐帛。议者多以为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譬如女工有绮縠,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说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

汉宣帝的评论虽然没有直接说出辞赋起源于《诗经》的话,但是其中“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数语,明显指出辞赋是继承《诗经》的传统的。当时最为流行且明确的说法是:“赋者,古诗之流也。”魏晋以后的学者都持此说,《诗经》为辞赋的一个源,确实无可怀疑,但辞赋不可能只有一个源。

其次,既然《楚辞》在时间上要早于汉赋,因此也就成了汉赋的渊源之一。《论赋》曰:“至如郑庄之赋‘大隧’,士蔦之赋‘狐裘’,结言短韵,词自己作,虽合赋体,明而未融,及灵均唱《骚》,始广声貌。然则赋也者,受命于诗人,而拓宇于《楚辞》也。”刘氏始把“楚辞”与“汉赋”视为中国文学史上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并且明确指出“赋”这种文学形式,以屈原的《离骚》为形成的标志。他也主张辞赋一体。

第三,《祝盟》曰:“若夫《楚辞·招魂》,可谓祝辞之组丽也。”刘氏明确说辞赋的某些篇章是效法先秦时代的祷祝之辞,并以《招魂》为例。他还指出,虽然汉代的祭祀已不如殷商那么虔诚,但“班固之《祀涿山》,祈祷之诚敬也。”其实,刘向之《请雨华山赋》,亦属此类。而祷祝之辞对于汉代文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郊祀歌》上。

第四,刘氏所谓的哀吊之辞“化而为赋”,见于他的《哀吊》。第五,刘勰并认为战国诸子的“杂文”也是辞赋形成的一个源见于他的《杂文》。第六,《谐谑》指出: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以及东方朔、枚皋那些供人们嬉笑的辞赋,皆出于先秦时代(如淳于髡)的诙谐戏谑之言。而荀子的《蚕赋》、东方朔的另一些具有隐晦性、娱乐性的赋作,则出于先秦的谑语(带有谜语性质的小文,后来演化为谜语)。

刘勰所提出的汉赋形成的六个源,或以作品形式立说,或以内容寻根,或以性质断言,或以创作方法究底。若从内容上探源,则源头甚多,故其

中唯先秦哀吊之文为辞赋之一源的说法,颇可商榷以外,其余各说,均持之有故,言之成理。

二、辞赋史的总结

《文心雕龙》之所以取得彪炳千秋的价值,除了它写成以华丽绚烂的辞章,明达新颖的观点,精湛系统的理论以外,从某种意义上说,它还是一部先秦至刘宋时代的文学史,亦即我国现存最早的文学史专著。辞赋的发展与演变,在从战国到刘宋的这段文学史上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因此,刘勰所总结的辞赋史,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论赋》、《镕裁》、《时序》、《才略》等篇,从不同的视角对辞赋史作了总结。

文学作品总会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时代的印记,《时序》就是叙述这种时代特征与文学关系的历史。《时序》论辞赋史则起自屈原、宋玉,“齐开庄衢之第,楚广兰台之宫”;“故稷下扇其清风,兰台郁其茂俗”。唯有齐、楚二国在频繁战争的年代还能崇尚文化,所以“邹子以谈天飞誉,驺奭以雕龙驰响,屈平联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风云”。汉朝初年,百废待兴,庶事草创,虽然未遑顾及文化,但素喜楚歌楚舞、服楚冠楚衣的刘邦,能唱《大风歌》,并为其戚夫人唱楚歌《鸿鹄歌》时伴以楚舞。汉武帝崇尚儒学,喜爱辞赋,自己尝作有《瓠子歌》、《悼李夫人赋》等多篇,又有礼聘枚乘之举,并使“买臣负薪而衣锦,相如涤器而被绣”,由于崇尚文学、爱好辞赋作为这一时代的特点,于是辞赋作家辈出,赋颂之作千篇。宣帝继承武帝遗风,成帝又有校书的盛事,对于辞赋创作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西汉的赋作大体上是继承了《楚辞》的遗风。东汉辞赋的风格比西汉有了较大的改变,“然中兴之后,群才稍改前辙,华实所附,斟酌经辞,盖历政讲聚,故渐靡儒风者也”。刘勰似乎比较喜欢建安以下的文学作品,用了较大的篇幅来叙述魏晋辞赋的创作,评论作家和作品的特点。虽然刘勰在《序志》篇中指责宋、齐文学的不良文风,但他对其时的一些优秀的文学家作了比较充分的肯定:“王袁联宗以龙章,颜谢重叶以凤采,何范张沈之徒,亦不可胜也”。《时序》篇概略地叙述了自唐、虞至于萧齐十代文学的历史;并总结了时代特点与文学的关系,说:“故知文变染乎

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时序》篇的赞语云：“枢中所动，环流无倦；质文沿时，崇替在选”。两段话很清楚地反映了刘勰的文学发展观：文学形式、文章风格，总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并且总是“染乎世情”，“系乎时序”，“崇替在选”，适应时代需要的。辞赋的发展和演变也是这样：楚辞演变为汉赋，某些辞赋又演变成骈文……。

辞赋作品的成功与否，取决于辞赋家的才华、气质和学识。《才略》篇则是刘勰叙述文学家才华史的篇章。兹就其中有关辞赋作家的部分介绍给读者。汉初曾经劝说刘邦崇尚文化，提出“能在马上得天下，岂能在马上治天下”口号的陆贾，“首发奇采，赋《孟春》而选典诰，其辩之富矣”；文帝时“贾谊才颖，陵轶飞兔，议愜而赋清”；枚乘、邹阳，“膏润于笔，气形于言矣”；司马相如自小喜爱读书，“师范屈宋，洞人夸艳，致名辞宗；然核取精意，理不胜辞，故扬子以为‘文丽用寡者长卿’，诚哉是言也”，意即司马相如注重文辞的夸饰，而影响了他的赋作的思想性；王褒善于辞赋的结构，“以密巧为致，附声测貌，泠然可观”；扬雄注重辞赋的思想性，“辞气最深，观其涯度幽远，搜选瑰丽，而竭才以钻思，故能理赡而辞坚矣”，刘勰比较欣赏扬雄那种文辞与思想性俱佳的才略；刘勰在《才略》中叙述了自屈原、宋玉、荀子以下至东晋末约 80 位辞赋作家的才华和特点。可以说《才略》篇是一部简明的辞赋作家史。

虽然刘勰没有明确论述辞赋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但他有几处论断，足以为我们引为辞赋史阶段划分的依据。比如：《时序》篇曰：“爰自汉室，迄至成哀，唯世渐百龄，辞人九变，而大抵所归，祖述《楚辞》，灵均余影，于是乎在。”辞赋史的阶段划分可以有多种标准，改朝换代、最高统治者的爱好与否、作品的内容和思想性、作品的形式等等，都可以作为依据，而刘勰以辞赋形式为标准。《时序》篇还说：“然中兴之后，群才稍改前辙，华实所附，斟酌经辞，盖历政讲聚，故渐靡儒风者也。降及灵帝，时好辞制，造羲皇之书，开鸿都之赋，而乐松之徒，招集鄙陋，故杨赐号为驩兜，蔡邕比之俳优，其余风遗文，盖蔑如也。”我们知道，西汉、东汉的辞赋显然属于两个不同的阶段，刘勰在这里不是简单地以改朝换代为划分依据，而是以辞赋

的内容、思想性、风格作为依据的；而且指出东汉从光武帝至灵帝为一个阶段，献帝的建安时代为另一个发展阶段。事实上刘勰也曾指出，西汉的辞赋也可以划分两个阶段，《才略》篇云：“然自卿渊已前，多役才而不课学；雄向已后，颇引书以助文；此取与之大际，其分不可乱者也。”如果说《时序》篇的两处论述并非直接关系到辞赋的阶段划分的话，那么这一段论述则是非常直接地专论辞赋史阶段划分的。西汉辞赋从汉初到王褒为一个发展阶段，扬雄、刘向所处的时代则为另一个阶段。整个两汉时代的辞赋，刘勰以为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诠赋》篇是辞赋发展的专门史；《时序》篇是文学的时代史（以时代为序列，但不是编年史，因为不以年代为序列），其中包含了辞赋的时代史；而《才略》篇则为辞赋作家的历史。从不同的角度总结辞赋发展的历史，是刘勰对辞赋学研究的一大贡献。然而，刘氏对于辞赋学研究的最大贡献还在于他提出了一系列纯文学形式批评的理论。

三、纯文学形式的理论

自从辞赋降临到人间后，伴随而至的是人们对辞赋作品的理解和评论。司马迁是最早对屈原赋作出评论，而且甚有影响的学者，他说：“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后来扬雄提出“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的观点，始注意到辞赋的形式问题，但未形成系统。班固、王逸的辞赋学理论，也多注重古诗之义、讽谕之事，亦即辞赋的内容、思想性、创作目的、社会效应等方面。《文心雕龙》则从辞赋的情辞关系、创作方法、丽辞、章句、声律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纯文学形式的理论。

关于章句。辞赋的结构形式是由字、词组成句子，由句子组成章节（即段落），由章节组成完整的作品。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恰恰是形式主义所应研究的对象。而且辞赋和骈四骊六的文章又特别讲究句子的形式。《章句》说：“夫人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他明确地

论述了字、词、句、章、篇的关系。然而,句子与句子、章节与章节之间的关系怎样处理呢?“然章句在篇,如茧之抽绪,原始要终,体必鳞次。启行之辞,逆萌中篇之意;绝笔之言,追媵前句之旨。故能外文绮交,内义脉注,跗萼相衔,首尾一体。”刘勰认为章句之间应该排列有序,鳞次栉比,同时要有一条主线索贯穿全篇。起首的辞句就应预先考虑到全篇的内容,结尾的语句更要承接前文的旨意。所以诗歌、辞赋、文章的章句的排列组合,在形式上就像华美的纹饰交错杂糅,而内部蕴涵的义理(即思想性、逻辑性、情理等)则应该一脉相承,就像枝干同花萼那样的自然衔接,首尾一致。这段有关章句与全篇的关系,以及章句与章句之间的技术处理的创作理论,可以说是千古以来不可移易的经典性论断。

关于句式和“丽辞”。辞赋的句子虽然不像《诗经》那样比较整齐的四言,也不像后来的律诗那样严格的五言或七言,但也需要有一定的范式。从辞赋衍生的骈文,其句式也需要整齐、对偶和一定的韵律。《章句》篇总结了不同诗句演变的历史:“至于《诗》、《颂》,大体以四言为正,唯‘祈父’、‘肇禋’,以二言为句。寻二言肇于黄世,《竹竿》之谣是也;三言兴于虞时,《元首》之诗是也;四言广于夏年,《洛纳之歌》是也;五言见于周代,《行露》之章是也。六言七言,杂出《诗》、《骚》;两体之篇,成于西汉。”所谓“两体之篇”,是指对偶句式出现在西汉的辞赋中,比如:《鹏鸟赋》“天地为炉兮,造化哦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扬雄《河东赋》“掉奔星之流旃,彊天狼之威弧”等等。西汉辞赋中出现的这种对偶句式,广为东汉辞赋作家所采用,以后遂演变为骈文;并且魏晋及后代的诗歌中亦多用对偶句。刘勰是很善于写骈文的,并把骈四六句式的写作升华为理论,他的《丽辞》篇就是讨论这一问题的。所谓丽辞:“造化赋形,支体必变,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评论司马相如、扬雄、张衡、蔡邕等人的赋作,说:“崇盛丽辞,如宋画吴冶,刻形镂法,丽句与深采并流,偶意共逸韵俱发。”辞赋中的对偶句写得十分优美,如画如冶,如刻如镂,既有深采,又俱逸韵。接着,刘勰指出丽辞有四种对偶形式:“言对为易,事对为难,反对为优,正对为劣。言对者,双比空辞者也;

事对者,并举人验者也;反对者,理殊趣合者也;正对者,事异义同者也。”对于这四种对偶句的优劣作了详细的分析,可能既是他个人的见解,也是他那个时代的观念。

关于字、词。《练字》篇简单探讨了文字的起源和流变,以及各种字书的编纂对于文字的统一和发展的作用,同时阐述了不同的时代所使用文字的不同风格。西汉“多赋京苑,假借形声;是以前汉小学,率多玮字,非独制异,乃共晓难也”。所谓“玮字”,即瑰玮不通俗之字,亦即奇字。我们通常会抱怨西汉辞赋中特别多的奇异字,尤以司马相如的赋作为甚。而刘勰认为“非特制异”,不过是后人不能通晓前世的文字罢了。东汉使用文字的特点是:有不少的文人是不通小学的;也有的作家是精通小学的。“及魏代缀藻,则字有常检”,文风转向通俗,晋代亦然,刘宋、萧梁文风更趋于通俗化。以下一段文字是刘勰关于练字的重要理论:

一避诡异,二省联边,三权重出,四调单复。诡异者,字体瑰怪者也。曹摅诗称:“岂不愿斯避,褊心恶啣呶。”两字诡异,大疵美篇,况乃过此,其可观乎!联边者,半字同文者也。状貌山川,古今咸用,施于常文,则齟齬为瑕,如不获免,可至三接,三接之外,其《字林》乎!重出者,同字相犯者也。《诗》、《骚》适会,而近世忌同;若两字俱要,则宁在相犯。故善为文者,富有万篇,贫于一字。一字非少,相避为难也!单复者,字形肥瘠者也。瘠字累句,则纤疏而行劣;肥字积文,则黯黩而篇闰;善酌字者,参伍单复,磊落如珠矣。凡此四条,虽文不必有,而体例不无。

文中指出四种遣字造句时所应该避免的弊端。前三种比较容易理解,唯“单复”实难。从其所指“肥瘠”来看,似与书法有关。刘勰自己对于遣字造句很讲究,骈文写得很华丽,但他却主张使用通俗易懂的字,“后世所同晓者,虽难斯易,时所共废,虽易斯难:取舍之间,不可不察”。使用文字时,既要符合时代的要求,又要考虑到后人的识读问题,不使用冷僻、诡异之字,是一种精审的练字理论。

关于“夸饰”的修辞手法。孟子指出:行文不能以文害辞、以辞害志。而辞赋中通常使用夸饰的修辞方法。《夸饰》篇曰:“至如气貌山海,体势宫殿;嵯峨揭业,熠熠焜煌之状,光采炜炜而欲然,声貌岌岌其将动矣。莫不因夸以成状,沿饰而得奇也。”刘勰认为夸张的修饰手法,“信可发蕴而飞滞,披譬而骇聋矣”,确实可以增强辞赋的感染力,但不能过份。“然饰穷其要,则心声锋起;夸过其一理,则名实两乖。若能酌《诗》、《书》之旷旨,翦扬马之甚泰,使夸而有节,饰而不诬,亦可谓之懿也”。刘勰把夸饰是否过份的标准定位于“能酌《诗》、《书》之旷旨”,未免迂腐,但多读《诗》、《书》,对于把握行文平允笃实的风格,或者是有帮助的。

关于比兴的创作方法。《比兴》篇曰:“故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比则蓄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寄讽。盖随时之义不一,故诗人之志有二也。”辞赋中比喻的方法有“喻于声”、“譬于事”、“方于貌”、“拟于心”四种。宋玉《高唐赋》“纤条悲鸣,声似竽籁”,马融《长笛赋》“繁缛络绎,范蔡之说也”,此“喻于声”者也;贾谊《鹏鸟赋》“祸之与福,何异纠缠”,此“譬于事”者也;枚乘《菟园赋》“焱焱纷纷,若尘埃之间白云”,张衡《南都赋》“起郑舞,蠶曳绪”,此“方于貌”者也;王褒《洞箫赋》“优柔温润,如慈父之畜子也”,此“拟于心”者也。刘勰认为辞赋中的比、兴方法不如《诗经》用得好,因此辞赋的

文学价值也就不如《诗经》。

关于声律问题。辞赋只吟诵不演唱,作为散文诗,既有声律问题,但又不像诗歌那样讲究。他对辞赋的声律问题讨论得较少,唯有一处明确讲到《楚辞》的声律问题:“《楚辞》辞楚,故讹韵实繁。及张华论韵,谓士衡多楚,《文赋》亦称取足不易,可谓衍灵均之声余,失黄钟之正响也。”刘勰以华夏的声律为正音,谓《楚辞》“讹韵实繁”、“失黄钟之正响”,果然不足取,但他确实了解到《楚辞》是用楚地方言为声律的特点。《章句》篇中有一段关于押韵的论述值得介绍给读者:

贾谊、枚乘,两韵辄易;刘歆、桓谭,百句不迁;亦各有其志也。昔魏武论赋,嫌于积韵,而善于贸代。陆云亦称“四言转句,以四句为佳”。观彼制韵,志同枚、贾,然两韵辄易,则声韵微躁;百句不迁,则唇吻告劳;妙才激扬,虽触思利贞,曷若折之中和,庶保无咎。

大意是说:如果换韵过多,则太嫌急促跳跃;若百句不换韵,则平淡乏味。这恐怕是辞赋创作中讲求声律的良方。

最后,关于“兮”字的用法。“兮”最早见于舜时的《南风》,《诗经》亦多见。刘勰以为:“诗人以兮字入于句限,《楚辞》用之,字出于句外。”其实《诗经》与《楚辞》都存在用“兮”字于句中或句末的情况,比较复杂,无法在此详论。他指出:“兮”如同乎、哉、矣、也一样,是“语助余声”。当为很好的语义诠释。

On Liu Xie's Achievements in the Study of *Ci* and *Fu*

WANG Tingqia

(Museum,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As one of the most outstanding literary writers in ancient China, Liu Xie was particularly expert at literary criticism. In *Wen Xin Diao Long*, he formulates the classical theory of literary formalism, which fully reflects his research on the form of *Ci* and *Fu*, a kind of literary composition, which is sentimental or descriptive and often rhymed. Also, in this book, he traces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Ci* and *Fu*, sums up the history of its creation from the Pre-Qin to the Liu-Song Period, and analyses its wording, stanza, exaggeration and rhyme. Therefore, he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study of *Ci* and *Fu*.

Key words: ancient literature, Liu Xie, *Ci* and *Fu*

(责任编辑:卢大中)